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电影的代际冲突：叙事转型与伦理重构

谭敏

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本文以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电影中的代际冲突为研究对象，通过叙事学、伦理学与创伤理论的多维视角，系统探讨代际冲突母题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叙事转型与伦理重构。研究发现，代际冲突的变奏根植于价值观传递的范式转换、“社群意识”的弱化以及“人的现代化”进程失衡三重动因，其核心体现为列维纳斯“他者哲学”视域下的伦理困境。本文指出创伤叙事已成为代际冲突的表意系统，通过边缘女性角色的蜕变实现传统创作模式的突破，又以残酷美学的戏剧张力重构家庭伦理的认知维度。影片通过文化基因传承与异质家庭重构的双向路径，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探索代际和解的可能性。研究同时指出，当前创作存在过度戏剧化与符号化倾向，未来需强化跨学科研究，深入挖掘代际冲突的社会心理机制与文化隐喻功能，为家庭伦理电影的本土化叙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现实主义；创伤叙事；残酷戏剧；伦理电影

DOI：10.69979/3029-2700.25.08.067

“新世纪”指2000年后的中国电影，因社会转型加速（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化、网络文化兴起）代际冲突呈现新特征，新世纪家庭伦理电影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代际冲突揭示社会转型中的伦理困境。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为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支点，而电影与列维纳斯的“他者”，就如同光学镜头所拍摄出的影像内容与电影的影像本体一般，这两个构成面合力组成了电影伦理。传统伦理长期强调“同一性”，忽视“他者”的独立存在，代际矛盾由此成为“自我”与“他者”的博弈场域。例如，《春潮》中母亲对女儿生活的控制，暴露了代际关系中“他者”主体性的消解。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家庭伦理电影逐渐从“对抗叙事”转向“共生探索”，今年大获好评的影片《好东西》塑造开明母亲形象，以理解与包容重构代际关系。这种转变不仅深化了影片的情感层次，更折射出社会对个体独立性的重视，为观众提供了审视家庭伦理的全新视角。

1 社群意识弱化与人的现代化张力

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催生了结构性矛盾：传统社群关系的瓦解与个体精神现代化的滞后，共同构成了家庭伦理电影中代际冲突的深层动因。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家庭的重要性，个人与家庭生活叙事由幕后走向前台。一方面，家庭伦理故事成为这一时期讲述社会伤痕、展现心灵创伤的载体；另一方面，进一步的个人化使得家庭伦理故事叙述的更多切入角度被发掘。独生

子女政策加速了家庭结构从“多代同堂”向“核心家庭”的转型，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的互助型伦理纽带逐渐断裂。家庭功能的高度集中化使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陷入脆弱境地——代际情感支持的缺失直接冲击个体的身份认同，导致“双重脱嵌”困境：既失去传统社群的庇护，又难以在现代社会建立稳定的归属感。电影通过角色塑造揭示家庭破裂对青少年人格的毁灭性影响，如边缘性人格障碍或反社会倾向，本质上映射了家庭作为“初级社群”的功能失效。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未能同步推动个体精神的现代化转型。许多父母虽身处现代物质文明中，却固守传统权威思维，将子女视为自我意志的延伸。这种“身体现代、精神传统”的割裂，在代际互动中表现为控制与反抗的激烈博弈。父母试图以旧有模式规训子女，而子女在现代化思潮中渴望挣脱束缚，代际矛盾成为“人的现代化”进程滞后的集中投射。例如，教育观念中工具理性对人性关怀的压制，或传统伦理对独立诉求的消解，本质上揭示了物质进步与精神滞后的深刻悖论。

社群意识的弱化与人的现代化滞后并非孤立现象，二者通过代际互动形成闭环。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加剧了代际关系的紧绷：父母将因社群解体产生的焦虑投射于子女，子女则以反抗挑战权威。这种张力以“创伤代际传递”的形式呈现——上一代因历史创伤固守传统，下一代在精神迷茫中陷入身份焦虑。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而家庭伦理电影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唯有在重建社群互助伦理与推动个体精神现代化的双重突破中，代际和解的曙光方能显现。

2 创伤视域下代际冲突的叙事转型

弗洛伊德将“创伤”定义为童年时期不可调和的心理刺激，成年后演变为行为失衡。家庭伦理电影中的创伤叙事超越个体经验，指向社会性与代际传递的集体创伤。代际冲突的本质，实则是不同时代创伤的碰撞与循环：上一代因历史苦难（如战争、饥荒）形成固化的传统观念，下一代则在现代化进程中背负精神断裂的迷茫。这种循环在《相爱相亲》中具象化为三代女性的观念冲突：姥姥因战争创伤坚守传统婚姻观，母亲受改革开放冲击追求现代生活，夹缝中的女儿则承受双重创伤的撕裂。创伤理论为这种冲突提供了阐释框架——家庭矛盾并非偶然，而是代际间创伤经验的外化。

电影通过视听语言将创伤具象化，强化其现实批判性。《唐山大地震》以元妮的愧疚与方登的怨恨为主线，通过闪回与时空交错叙事，展现地震创伤如何在代际间延续。观众目睹元妮因重男轻女观念酿成悲剧，方登因被遗弃而封闭情感，最终在和解中完成自我救赎。此类叙事不仅揭露创伤的传递性，更引导观众反思亲情本质与社会伦理责任。创伤理论与家庭伦理电影的深度融合，使影片超越个体悲剧的呈现，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载体，推动现实中的代际理解与伦理重构。

3 冲破枷锁，边缘女性角色的蜕变

边缘女性角色是家庭伦理电影中代际冲突的重要载体，其蜕变历程映射社会变迁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早期电影如《神女》（1934）塑造被动受难的女性形象：女主角为生计沦为暗娼，最终在贫困与歧视中走向毁灭。此类角色囿于传统叙事框架，缺乏主体性，仅作为社会苦难的符号存在。

新世纪电影则突破这一局限，通过女性在代际冲突中的主动抗争，重塑其主体价值。《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面对丈夫背叛与家庭重压，选择以“扁担”工身份独立谋生，在底层挣扎中完成从依附者到自立者的蜕变；《送我上青云》的盛男身患绝症，却拒绝向命运妥协，通过职业追求与自我救赎，打破“被拯救者”的刻板设定。这些角色不再被动承受代际压迫，而是以坚韧与智

慧重构家庭关系，彰显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

然而，当前创作仍存在局限：部分影片不自觉地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忽视其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实际上，现代社会为边缘女性提供了更多资源与机遇，创作者需深入挖掘其复杂心理与成长潜力，如“高自尊缺爱型”角色的塑造，既能引发共鸣，又能揭示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多重规训。唯有超越传统叙事窠臼，边缘女性形象方能真正成为代际冲突中人性力量与社会批判的象征。

4 代际冲突中的残酷美学：直面人生

伦理电影抛开立体的女性叙事还有较为丰富美学叙事，法国的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在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首次提到“残酷戏剧理论”，旨在通过戏剧艺术表达人性的残酷、暴力、痛苦或不幸，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或反思，挑战和革新传统戏剧形式。笔者认为现当代的伦理电影中出现了同样利用感官刺激，如暴力、流血、尖叫等元素，使观众震惊，从而改变自我以及社会的表现形式，这种展现创伤冲突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艺术手法值得电影创作者学习和借鉴。

4.1 复仇爽感与社会意义

复仇元素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创作元素，不仅可以展现角色人性的复杂，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是残酷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伦理电影的范畴内，“复仇”这一主题源远流长，从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到现代的各类影视作品，复仇元素在家庭伦理戏剧长河中拥有着持久的魅力。2024年豆瓣电影全球最受欢迎的十部复仇电影有六部与代际关系挂钩，而中国的情况虽有所不同，豆瓣最受欢迎的十部中国复仇电影80%与爱情挂钩，但也足以表明代际冲突与复仇元素的结合存在着巨大的创作潜力与空间，像2024年上映的《涉过愤怒的海》《默杀》《彷徨之刃》以及2025年的《误杀》等影片，都是这种结合的典型代表。复仇元素在家庭伦理电影中兼具情感宣泄与社会批判功能。《涉过愤怒的海》通过问题少年与暴烈父母的对抗，揭示家庭教育缺失与社会支持系统的失效；《河边的错误》以唐氏儿童隐喻命运不可控，暗指社会冷漠加剧家庭困境。此类影片将现实中的代际矛盾（如教育失范、阶层固化）戏剧化放大，警示其可能演变为系统性危机。

然而，过度追求“复仇爽感”易使影片陷入误区。

部分作品滥用暴力美学与猎奇情节（如极限追击、夸张妆造），将复仇简化为视觉奇观，弱化其批判内核。真正的复仇叙事应如《三块广告牌》，在冲突中追问正义本质——家庭伦理电影需以代际矛盾为切口，揭示复仇背后的人性挣扎（如愧疚、救赎），而非停留于情绪宣泄。唯有平衡感官刺激与思想深度，复仇元素方能成为代际冲突中照见社会病灶的棱镜。

4.2 爆炸式的情绪化渲染

除此之外家庭伦理电影中还常常运用极端的情节冲突和视觉渲染来强化代际冲突的张力，这种手法进一步凸显了电影的残酷美学。从电影表演的维度深入探究，米歇尔·福柯于《疯癫与文明》所阐述的理念极具启发性。他指出“疯癫并非单纯的病理现象，实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文明的独特表现形式，更是文明自我反思的关键途径”。当这一概念延伸至电影学领域，便衍生出夸张的暴力美学，其典型特征便是超越常规文本理解范畴的过度行为表演，这种渲染本质是福柯所述“疯癫作为文明自省”的影像化实践。《涉海》中母亲景岚驱车冲崖寻子，看似疯狂之举，实则是代际沟通断裂的极端外化——家庭未能建立情感联结，危机来临时只剩绝望的自我消耗；《山河故人》中张晋生引爆炸药，隐喻阶层分化与利益争夺对代际关系的异化：父辈的物质焦虑投射于子辈，最终引爆伦理危机。

此类渲染并非单纯的戏剧夸张，而是对社会痼疾的隐喻式批判。《万箭穿心》中李宝莉与儿子的肢体冲突，以暴力场景揭露底层家庭情感表达的病态化：贫困压力

与代际隔阂扭曲亲情，爱以伤害的形式存在。电影通过手持镜头、高对比色调等视听语言，迫使观众直面代际冲突的疼痛本质，进而反思其社会根源——家庭沟通机制的失灵与传统伦理的断裂，需通过艺术化的“疯癫”呈现，唤起疗愈的集体意识。

5 结语

新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电影通过代际冲突的多元叙事，深刻映照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裂变与伦理困境。代际矛盾的核心已从简单的观念对立转向创伤代际传递、个体现代化诉求与传统伦理束缚的复杂博弈。边缘女性角色的蜕变与残酷美学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人物塑造的层次，更凸显了家庭作为社会缩影的批判功能。然而，部分影片仍存在叙事失衡问题：或沉溺于戏剧冲突的感官刺激，弱化代际和解的可能性；或囿于传统框架，难以回应多元文化交织的现实挑战。

参考文献

- [1] 马恩扉页. 袁智忠. “镜像”之间：面向他者的面容、欲望和时间——列维纳斯与电影伦理[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3(10): 4-14.
- [2] 张晗. 《都挺好》：“原生家庭”之思——兼谈家庭伦理剧发展[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0, (02): 98-100.

作者简介：谭敏，1998年9月21日，女，汉族，湖南省湘潭市，广东财经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影视批评。